

梳理历史文脉 增强历史主动

——“联通的力量:运河与文化脉络”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李胜疆 路璐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3)01-0143-07

2022年9月24—25日,“联通的力量:运河与文化脉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农业大学学术交流中心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南京农业大学主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担任指导单位,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课题组“大运河历史文脉梳理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承办。来自美国匹兹堡大学、堪萨斯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东京都立大学、奈良教育大学、关西外国语大学,韩国高丽大学、釜山外国语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扬州大学、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中国民俗学会、日本歌谣学会、韩国民谣学会、韩国东方史学会以及南京农业大学等30多家高校院所及相关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9月24日上午,大会举行开幕式。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卢勇教授主持开幕式,南京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吴荣顺代表主办方致辞,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课题组“大运河历史文脉梳理与国家形象建构”首席专家、会议发起人路璐教授发表讲话。南京大学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贺云翱,南京农业大学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盛邦跃,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叶扬兵、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书记李日葵等出席开幕式。

随后,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朱英主持,美国堪萨斯大学赫尔杰出教授(荣休),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环境史创始人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美国匹兹堡大学世界史研究中心主任马瑞诗(Ruth Mostern),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贺云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马俊亚分别围绕《运河而非河流:五十年后的李约瑟“水利”中国》(A Canal Is Not a River: Joseph Needham's "Hydraulic" China after Fifty Years)、《黄河流域史上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空间分析》(The Spatial History of Erosion on the Loess Plateau in the History of the Yellow River)、《中国大运河是联通世界的“桥梁”——以考古发现为例》、《天则何咎?明清淮运水患与“小冰期”关系辨析》等作了主题演讲。

9月24日下午,会议设置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运河故事与运河话语”为主题的圆桌论坛环节。《江苏社会科学》主编吴玲,《南京社会科学》副主编虞淑娟,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资深考古专家路侃,《中国社会科学报》江苏记者站副站长、《现代快报》记者王卫,江苏省交通厅京杭运河苏北航务管理处资深摄影师贾传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洁等与在场的专家学者们就大运河的文

[收稿日期] 2022-11-30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运河历史文脉梳理与国家形象建构”(21JZD041)

[作者简介] 李胜疆(1994—),男,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技与社会、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路璐(1980—),女,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大运河农业文明分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科技传播、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化传播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对话。论坛嘉宾们一致认为,对于大运河文化传播要借助科技赋能来讲好运河故事,既要关注历史与文化,也要聚焦现实与民生,从而实现大运河文化的强势辐射与有效传播。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王健研究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徐吉军研究员、南京农业大学的路璐教授与何彬教授分别主持了后续会议。与会专家们围绕大会主题展开了三方面的热烈交流。第一,文脉梳理:运河漕运与社会变迁。在该议题中,与会专家们认为大运河在历史时期发挥过重要的“桥梁”作用,无论是漕运在国家资源调配中的动脉功能,抑或是运河治理对地方社会的结构性影响,均体现着大运河联通南北、辐射东西的广泛影响力,同时对以往运河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再获新解。第二,文化记忆:流域文化与沿运空间。在该议题中,来自中日韩的专家学者们试图在对本国流域文化进行特色呈现的基础上,勾勒出存在于不同流域文化中的“普遍价值”以实现交流互鉴。第三,文化遗产:理论视野与实践探索。在该议题中,来自不同学科背景与不同国家的专家学者们以多维视角对运河遗产在主体认识上提出诸多新的思考,并在学科融合背景下运用以数字人文为代表的前沿路径为大运河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增长点。

一、文脉梳理:运河漕运与历史变迁

中国传统农业资源在空间分布上是不均衡与不对称的,从总体上看呈现出东多西少、南高北低、各有聚集的局面,且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自宋以来存在着愈发明显的空间错位,粮食安全与国家安全具有直接相关性。因此,为维护国家统一与政权稳定,封建王朝设计了大运河这样一种巨型水利工程以沟通南北经济、确立政治中心、调配国家资源,建立安全高效的粮食运输体系。大运河作为关涉社会结构变动的人工河流,是人类在科学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为实现对资源的跨区域调配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杰作,呈现出人类对水资源的最高统筹形式。正如南京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吴荣顺在致辞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大运河发端并形成于农业技术体系之下,在没有石化动力、只能依靠人力畜力的时代,在没有现代科学技术支撑的情况下,依靠空前的想象力和长期的劳动实践,完成了在巨大时空范围内的水利资源勘察与线路规划,实现了多项技术发明与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创造了中华文明的奇迹。”因此,“漕运”不仅在古代体现了运河的核心功能,而且在当下也成为运河研究的中心议题,在与会专家的研究中,运河漕运可分为整体与地方、历史与当下等多个层面。首先,专家们既关注漕运之于整体历史中的“联通”功能;其次,也聚焦于漕运对地方社会产生的结构性影响;最后,专家学者们对大运河的历史概念及近现代转型进行了新阐释与新梳理。

(一)大运河联通着内部网络与外部世界

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副院长李恭忠教授在报告《大运河的国家动脉功能——来自清代中期的两则例证》中借全汉昇的说法将这一时期运河漕运形容为国家的“动脉”。一则例证为大运河在鸦片战争中曾起到了挟制清廷的重要作用,如1841年10月2日,负责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印度殖民地监管事务的内阁大臣埃伦巴勒勋爵(Edward Law, 1st Baron Ellenborough, 1790—1871)致信维多利亚女王,“阻断中华帝国内部最主要的交通”,迫使中国政府同意签订一份让英国人满意的条约。另一则例证是乾隆五十四年间福康安等大臣私托漕船洒带桅木致使漕运迟缓一事,从其中便可看出大运河与大宗货物的跨区域流通情况,为大运河联通南北的重要作用再添新证。而日本早稻田大学熊远报教授也持类似观点,熊远报教授在报告《京杭大运河与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中认为这条长约1800公里的人工运河跨北纬30~40度之间,经过比较复杂的地形与不同的海拔高度,连接以长江、淮河、黄河为干道的中国主要水系,其开凿与维护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在明初恢复内河航运至清末重启海运的约五百年间,京杭大运河作为维系政权、支撑王朝经济财政运行的生命线,成为当时在南北大地域之间的唯一一条“物流高速通道”。运用大运河这一视点得以整体性把握明清500多年,尤其是16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经济的显著

变迁与总体概貌。此外,要将大运河研究放置世界史的视野下继续展开,可以发现它还是明清时代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地区乃至西方社会的经济、文化发生联系,维系朝贡册封体系以及国际关系的重要通道,不仅日本、琉球以及东南亚一部分国家的使节、商人与他们携带的贡品、商品,乃至宗教相关人士等主要利用了这个通道,而且也成为中国16世纪以来对外不断扩大的国际贸易通道。在这一点上,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贺云翱教授则以考古学证据更加直接地论证了大运河之于世界的“桥梁”作用。其一,大运河本身是古代“海外客使”在中国境内的重要交通通道;其二,大运河对中国古代海丝城市或港城的形成发展有着巨大的支撑作用;其三,大运河对古代外国商品或其他文化元素在中国内地的输出发挥着重要作用。贺云翱教授以江苏如东“掘港国清寺遗址”及“隋唐掘沟遗址”的考古发掘以及“黑石号沉船”“新安沉船”等考古发现为例,从瓷器归属窑口与销运地点的连线中揭示了大运河何以成为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通“桥梁”。他认为中国大运河由于其广阔的时空跨度、巨大的成就、深远的影响而成为文明的摇篮,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因此古代中国的大运河开凿、管理、运行本身就是一种国家文明行为,而不仅仅是一项纯粹的交通、水利工程。

(二)大运河对沿运社会产生了结构性影响

浙江大学孙竞昊教授在报告《环境·市场·城市化:明清时期山东西南部运河区域的形成》中将目光投至大运河沿线的华北平原地区,认为大运河及周边水利工程重塑了当地的自然条件,并在此推动下山东西南部的贫困地区变得充满经济活力,漕运带来的这种“外部增长”的发展模式促使这一地区向商业化与城市化转型。政府通过指导这些区域的地理空间和生态转型,从而影响着当地的权力关系,并借其实现了政治经济目标。南京农业大学的吴昊老师从饮食文化入手,认为漕运为大运河山东段带来了丰富的南方食材,带动了餐饮服务业的发展以及深刻影响了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饮食观念及风尚,这也是山东运河区域饮食生活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为“南食之风勃兴”“猎奇、竞奢心理普遍”“被动性与主动性并存”“多元化和时代性展现”等方面。南京大学马俊亚教授则在报告《天则何答?明清淮运水患与“小冰期”关系辨析》中回应了近来学界的一个热点,即“近年来不少学者把淮北水患归于明末出现了所谓的‘小冰期’,并且认为在明末出现粮荒时,美洲传入的玉米、番薯正好缓解了这次危机”。马俊亚教授从海河流域植稻的史实出发,认为“小冰期”并不影响海河流域稻米生产,那么就淮北稻米种植业的消失而言,“小冰期”绝不会是主因,进而批判性地提出淮北水患与统治者的治理失策有着强关联性。

(三)“大运河时代”的提出与大运河文脉梳理

韩国高丽大学曹永宪教授以历史学家的研究使命入手,力图把握时代精神,寻找时代性差异以划分时代。曹永宪教授认为在1415年永乐帝的废“漕粮海运”引发的“蝴蝶效应”整整持续了370余年。至1784年乾隆帝利用大运河完成最后一次南巡,标志着清代对大运河的掌控力与生命力到达了顶点也即最后时期,而伊懋可指出在18世纪下半叶,中国的水利经济(water-control economy)面临着前近代的“技术锁定”^①,而1784年的“广州教案事件”与“中国皇后号事件”也说明了这一年是“大运河时代”的终点。因此,广义的“大运河时代”指7世纪至19世纪,而狭义的“大运河时代”特指1415年至1784年间的370年,这一概念的提出旨在解释15世纪至18世纪中国的整体特点。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叶扬兵研究员在其编纂《近代大运河史料集》的过程中发现近代大运河在水系环境、交通价值和中外关系方面面临着三大变局。“黄河北徙”从根本上改变南宋以来六七百年的黄河南泛状态,使大运河水系环境发生根本变化;之后造成的黄河以北运河淤塞不通,而轮船铁路在这背景下的兴起又开启了中国近代交通的新格局;西方新学的引入又为大运河的治理增添生机和活力。面对这些变局,近代大运河的治理也几乎同步转型,其一是近代大运河治理体制经历了由集中到分散再到集中的复杂嬗变;其二是治运目标发生调整,即“漕运至上”调整为“防洪优先”;其三是在向近代西方水利科学的学习中,运河治理技术有

^①技术锁定指虽然不是最先进的技术,但是占据着优先地位,并不得不继续保持这种状态的情况。

了长远进步。

二、文化记忆：流域文化与沿运空间

农业时代的河流为沿线区域带去了发展要素,沿线居民正是在人与水的互动中展开了文明图景,分散的地理空间也得以以河流为线索串联成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线路,因此河流是流域文化的生长载体及记忆生产的重要场所。河流所承载的流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既有“开放、包容、共生”的共通意义,又有在不同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下的个体特色,与其关联的文化记忆更是民族国家寻回国家身份与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文化资源。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大河文明一样,被河流及其流域文化形塑着空间结构与精神品格,长江、黄河文化以“江河互济”的文化格局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提供了重要支撑,大运河文化则以“联通南北,交流东西”的国家力量为中华文明的文脉交融提供了不竭动力。与会的国外专家学者们同样积极探求本国河流在与沿线空间互动中所形成的流域文化(河岸文化),并尝试为本国文明的发展脉络提供注解。

(一)船歌号子

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郑土有教授在报告《长江下游地区的船歌及其文化》中指出,长江作为中国的“黄金水道”与大运河一道为两岸民众带来了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船歌便是其中独具特色的代表。长江下游的船歌既有着与上游、中游地区的相同特征,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如码头号子与纤夫号子,相对于前二者出现了比例上的变化,音乐律动更为舒缓等。同样以本国重要河流的下游船歌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有来自韩国釜山外国语大学的权五庆教授,其在《韩国洛东江下游地区的船歌和文化》中采用类似方法对该流域的船歌和文化作了梳理。权五庆教授认为河岸文化是人与物进行交流的现场,是文化聚集地,也是新文化的发祥地,应以“数字地图”的形式使其连接传统、现代与未来文化。与郑土有教授类似,权五庆教授首先以韩国学者的视角表达了韩国“河岸文化”研究相较于中、日两国的弱势地位,继而倡导对该文化的多维度研究及商业化利用,并且要注重中日韩学者们在不同视角下的比较研究。而来自日本奈良教育大学、关西外国语大学的名誉教授真锅昌弘则以《河川的纤夫号子及其他——思考河川及运河的文化》为题作了主题报告,真锅昌弘教授难能可贵地提供了一个“他者”视角,即将日本的河川、运河与文化史研究作为案例,与中国的长江、嘉陵江及大运河流域文化进行跨国的横向比较。报告认为日本纤夫们的劳动和娱乐生活,鲜明地展现了人们情感面的相互关联,其中又蕴藏着运河文化的形成发展,而中国的“川剧”同样表现了在长江、嘉陵江一带劳作一生的纤夫们的生活世界,体现了劳动与“艺能”的结合,北京运河边饮水的石龙雕像则体现了水、运河、桥与神话动物的联系,同时又展现出运河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

最后,中国历史研究院的邹明华特聘研究员在《汉江船工号子传承人访谈的情况报告》中从中日韩联合考察的综合性眼光与田野调查出发,对峡江船工号子的传承发展进行论述。报告认为虽然峡江船工号子经由世代承袭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谱系,但由于生产工具、劳动方式以及船工号子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其传承、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四位专家或以自身视角、或以比较视角、或以综合视角分别论述了各自的船歌与号子研究。概言之,尽管国别与视角不同,但仍可看出船歌或号子这种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沿线居民与河流的互动中动态生成的,彼此均面临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时代转型的传承困境。

(二)民俗文化

南京农业大学的何彬教授在其报告《日本河川文化研究概述》中首先铺陈了中日两国学者关于各自河川文化的文献综述,其次就田野调查中听闻的“水品与人品”“家风、村风与水风”的谚语切入风土环境

对当地文化影响的研究,最后从上述田野的话语与启示中指出存在一种“民俗风土论”。何彬教授认为河川河流是文化的流通过路,它可以随着船人以及物的流通运输,带去文化的交融,同时它也是阻断交流沟通的屏障,具有两面性,这种具有两面性的河川,形成了多河流区域的文化系统特征。而民俗学角度的河川研究,要着重关注含有人们各种民俗思维的与河川关联的行为和思维表象,把握“水品”“水风”,诠释河川表象深层的民俗风土。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的牛承彪教授继续以《水神信仰与人牲习俗——以日本的事例为中心》为题,向大家论述了以“八岐大蛇”神话为代表的日本水神信仰与人牲习俗。牛承彪教授将中日两国的河伯信仰与筑堤中的人牲做对比,并指出“人可以征服河川”是水神信仰与人牲传说的基本背景,这一信仰还能通过大陆移民的口传进行传播,其结果是这些信仰依旧影响着日本某些地区的民俗仪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毛巧晖研究员也以“天妃”的信仰传播为例,揭示了商业、漕运、信仰三者间呈现出的强关联性。毛巧晖研究员在报告《“北运河流域民俗文化普查活动及民俗志编纂”项目的思考》中认为,在运河流域民间文艺形态的代际传承中,运河文化网络中文化主体与文化现象不断交流、交融与共生,以一种流动的方式将散落的文化记忆加以关联。且对于民俗仪式秩序感与时间感的强调以及人们的积极参与,共同构成了超越个体、村落、地域的“流动”的运河记忆,并借助运河文化网络,推动村落多维文化认同的建构。浙江工商大学的周鸿承副教授在报告《船说运河:运河上的“绿眉毛”与船民生活空间叙事》中以运河漕运中具体的“漕船”为研究对象,从造船技术、历史演变、人船关系、附属设施等具体视角展示了漕船的历史演变以及在船民生活和运河漕运中曾发挥的历史作用,并认为中国大运河上的船只不仅是“水上王国”居民的生活家园,也是国家政权履行其历史使命的工具,更是中外商贸流通、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三、文化遗产:理论视野与实践探索

大运河文化遗产是运河类文化遗产的突出代表,其在空间规模、历史限度与联系对象上均牵涉甚广,因此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理论认识与保护实践需要来自不同层面、多维视角及具有国际视野的交流合作。目前,对于大运河文化遗产基本可从“一个”与“一类”两种视角进入其认识域,前者将大运河文化遗产视为一个遗产个体,其与牵涉对象是不同遗产单元之间的对话关系;而后者将大运河文化遗产视为一类遗产范畴,其与牵涉对象是同一范畴下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但无论如何,大运河始终是与传统农业体系相伴而生的文化遗产,它以解决大宗粮食货物的跨区域调配为基本特征,支撑着历史时期农业体系的紧密运行。因此,该视角下的大运河文化遗产是以水利遗址、流域文化、运输功能为核心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根据对其认识的切入视角不同也各有侧重,总的来说本次会议对此进行了具有多项学科交叉性质与宽阔国际视野的热烈交流。

(一)多维视角下的运河主体

作为会议发起人与课题组首席专家,路璐教授长期致力于以新视角、新路径探索大运河文化遗产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以巨型文化遗产作为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建构国家形象。因此,路璐教授在其报告《大运河与国家记忆之场建构》中首先就认为大运河是一种巨型文化符号,其一旦被国家主体征召,它所携带的历史灵性与文化基因就能够建构出适合当下文化语境的记忆之场,并进行自身的形象生产。其次要认识到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三重价值属性:“混杂性、被赋予性与当下性”,上述三者彼此间既有共同趋向又有内部张力。报告指出,大运河作为记忆之场要理清其内部的分类与构成,从而把握大运河记忆之场的建构目的——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大运河作为记忆之场的特殊功能在于把晦涩的时间“转译”为具象的空间,缔造一种文化记忆的地形学,关键在于实现国家的可视化,在历史的蜿蜒曲折中找到一以贯之、不曾断裂的文化记忆,完成它征召个体、形成集体身份的使命,由此构建国家共同

体。南京大学的丁和根教授在其报告《文化符号学视域的大运河历史研究》中直接以“大运河文化有没有特定的符号系统”作为基本问题域,继而又对问题域中“大运河有没有特定的文化传统”“大运河符号系统是如何构成的”“大运河符号系统是如何演化的?”接连追问并作答。丁和根教授认为大运河在跨越众多文化区的过程中会面对文化系统内部同一性与异质性的问题,那么辨析其内在结构与控制力量就至关重要。大运河文化传统之所以得以传承是由于其内生性与自发性,而大运河符号系统在构成上有着文本与元文本的分别,关键在于指明有影响力的文本并加以分析。这类元文本与南京农业大学李明教授所说的大运河主体文化基因在功能上接近,李明教授的报告《文化基因视角下的大运河文化遗产梳理与价值挖掘》指出,大运河文化基因是内在于各种大运河文化遗产和文化事象中,能传承大运河文化内核的最基本单位,是那些对大运河文化和历史文脉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价值观、心理底层结构和思维方式,是决定大运河历史文脉传承与变化的基本因子和基本要素。而大运河文化基因又有着“主体文化基因、附属文化基因、混合文化基因与变异文化基因”的分类,其对应着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核心层、附属层与衍生层”。来自美国堪萨斯大学赫尔杰出教授(荣休)、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环境史创始人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则以环境史视角与更广阔的视野对运河认识提出不同见解,他以《运河而非河流:五十年后的李约瑟“水利”中国》为题展开主题演讲并提出与科技史学家李约瑟不同的看法——“运河不是河流”。唐纳德·沃斯特教授进一步认为,在李约瑟关于水的“防灾、种植、运输与军事”四种“有用的知识”外,还应考虑到其所忽略的、也是当时中国所急需的另一种“知识”,即“如何利用水来养活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上述需求均来自日益增加的以传统农业为生的人口压力,而农业的扩张也进一步发展了更先进的农业技术、更复杂的社会组织与日益增长的经济剩余。农业文化以驯化自然为目的,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对水、庄稼与牲畜的驯化,大运河就是这种“驯化”的代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李约瑟的视野进行有意识的“超越”,因为我们已经拥有李约瑟所不能体验的更加先进的方式与宏观的视野去感受水的流动,这就要求我们去进一步的批判性思考,即这种利用方式是否会对环境带来变化。

(二)交叉融合背景下的实践探索

环境史与数字人文在近年史学研究的学术议题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研究领域的新开拓与研究方法的新融合无疑促进了相关各方的知识生产。与会专家们同样从自身相关研究出发,为大运河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美国匹兹堡大学世界史研究中心主任马瑞诗近年的相关研究聚焦于利用GIS研究黄河流域的生态变迁,在其报告《黄河流域史上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空间分析》中就强调以科学信息(Scientific Information)、数据库和地理信息系统(Databases and GIS)、历史资料(Historical Records)三者协同,弥补传统史料研究的不足,通过跨领域及学科交融去拓展研究视野,以便为传统黄河研究的“旧问题”去提供“新观点”。研究利用空间数据直观地呈现出历史时期黄河生态演变过程,其中包括高原上聚居地的散布趋势、土壤侵蚀的变化趋势、气候影响下旱涝灾害的发生趋势以及水利建设的投入趋势等,得出黄河流域的灾害初现于汉(史料记载)、肆虐于宋、缓于明清且各有特点的结论。马瑞诗教授谦称自己是在清朝治河名臣陈潢及两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和史念海先生的铺陈下展开研究的,所做的工作强化了前辈们的观点,贡献在于新的方法与视野。南京农业大学的胡燕教授则着力于另一条母亲河——长江干流地区“非遗”的数字人文研究。报告《长江干流人类非遗的数字化探析与实践》认为,具有吉祥文化表征的长江干流的巴蜀文化、楚文化与吴文化等三大文化聚落的20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理空间与虚拟空间中,具有稳定的共同价值与文化信仰,反映了该空间下历史时期的风土民情及其千丝万缕的相关性、传承性与生态性,显示极强的凝聚力与归属感。从地理空间中人类非遗的水水相连的空间相关性、口口相传以人为本的活态传承、生生不息的局部分化与整体融合,到在虚拟空间突破长江流域千百年人类非遗传承模式,技术进步推动人类非遗的社会变迁,也促进非遗学科亟待建构。南京农业大学的翁李胜副教授选取大运河森林公园为研究对象,在其报告《旅游地形象感知对游客感知价值与忠诚

度的影响研究——以大运河森林公园为例》中以旅游地理的视角及方法揭示了旅游地形象感知对游客感知价值及忠诚度的影响,以及性别在该影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认为自然形象感知、旅游基础设施的感知、情感形象的感知均对游客价值感知与目的地忠诚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游客的感知价值在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对忠诚度的影响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该研究为后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旅融合提供了相关参考。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的黄杰副院长为会议报告了“世界运河城市论坛”的发展经验,旨在提升中国大运河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他在报告《WCCO、WCCF与运河文化国际交流互鉴》中指出,目前虽然WCCO(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国内外会员数量有所增长、会员城市所在国覆盖较广、论坛合作发展水平层级有所提高,但在论坛组织策划能力上有待提升,包括国际化程度欠缺、学术性不强、国际参会比例失调、传播能力较弱、影响力不够等方面的现实问题,这要求后续论坛设置要在上述方面进行针对性的加强。

结 语

“联通的力量:运河与文化脉络”国际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与会专家学者们围绕运河的文脉梳理、文化记忆与文化遗产三方面展开了充分讨论,分享了不同见解又达成了诸多共识,议题基本覆盖了当下运河研究的主要方面。同时本次会议还体现了至少两方面的特色。一方面是“聚焦学术前沿,回应学术热点”,会议云集多国学者并涉及不同学科,但始终以学术引领议题设置。本次会议既为历史学科与相关学科的沟通拓展了渠道;又为学界与新闻界的交流搭建了平台;还为南京农业大学的对外学术交流提供了窗口。大会专家学者们还就“小冰期与灾害”“运河与环境”“保护与传承”“史学研究方法的传统与当下”等学术热点问题做了精彩论述。会议全程体现了专家学者的权威性、学术思想的深邃性以及研究探索的前沿性。另一方面是“紧扣时代命题,对接现实需求”,《“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指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在错综复杂国际环境中化解新矛盾、迎接新挑战、形成新优势,文化是重要软实力,必须增强战略定力、讲好中国故事,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持久而深厚的精神动力。”^①会议充分展现了“文化”是跨越国界、联通各方的重要力量,而大运河作为巨型文化符号是凝聚国家力量、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文化资源。会议还就“大运河在后申遗时代的接续发展”“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路径”“大运河文化的社会传播”等现实问题展开讨论,为运河实践提供了理论参照。

总之,大运河既是绵延千年的历史文脉、穿越南北的交通动脉,也是当下彰显中华文明特质、衔接国际空间战略布局的国运命脉。近年南京农业大学成立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农业文明分院,推动大运河研究的持续发展,重视挖掘大运河文献资料背后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以传承与创新大运河文化为基点,开展重点项目攻关,在国内外相关领域形成了以农史为学科依托,延展至大运河研究的学术路径。此次会议正是该路径下关于大运河文化研究的一次学术盛会,国内外专家学者们为大运河的历史、当下与未来各抒己见,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我们相信,在各位专家学者及关心大运河发展的各界人士的努力下,大运河文化价值将愈发受到重视,围绕大运河的学术研究将更具活力,大运河也将以其自身的文化魅力继续为联通各方贡献更大力量。

(责任编辑:胡文亮)

^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OL].http://www.gov.cn/zhengce/2022-08/16/content_5705612.htm.